

“五四”前后国学研究学术思想的新变（上）

○ 刘石



刘石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1980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1987年硕士毕业，1991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古典文献学。著有《书法与中国文化》、《苏轼词研究》、《苏轼词选》、《有高楼杂稿》、《有高楼续稿》、《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宋辽金卷）》等。

20世纪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激荡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了20世纪开始加速，并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经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除社会政治的变革外，思想文化的变化也十分剧烈。西方文化在这个剧烈的变化过程中不止是催化剂，毋宁说起到了指明灯的作用。当时一批励志社会的有识之士以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文化为指南，对陈腐的封建旧文化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抨击。如果说抗敌御侮、救亡图强是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最强音，那么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开启民智则成为时代文化思潮的主旋律。梁启超在那部影响颇大的《清代学术概论》开头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离朱易百步而难眉睫”（韩非语），梁启超这部书作于上世纪的1920年，所以尚无法立即将开启中国文化新世纪的“五四”文化思潮收入自己的视野中。当然，作为一部论述清代学术的书，不提及清以后也是不足怪的。不过我们应该知道，相对于梁启超提及的这四个时期，“五四”时期以科学和民主相号召的新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由传统而现代的转折点，其意义因此显得空前重大和突出。国学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样经历着、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国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也在这时正式开始了。

“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期

进入20世纪以后，国学的命运如何？我们以作为国学重要内容的古典文学研究为考察的实例来看。“五四”以前的20年，虽然身处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中，古典文学的因素仍然相当浓厚。现代文学史家刘纳近些年对这段久为人忽视的文学史作了有深度的清理。她说：“在新生的、混乱的民国，社会的动荡正造成价值尺度的迷失，社会制度转型期的实力政治正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受到最严厉的检验，一代文人处于试图重建价值信心的困惑和焦虑中。与追恋古风的道德选择相关联，他们格外迷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不仅遗老们执拗地维护着古典文学的经验，许多曾经‘新’过的人也表现出复古的趋向。在民国与帝制交替的那几年里，在一片‘人心日非，世衰道丧’的慨叹声中，诗文成为挽回传统文化沉沦厄运的最后希望之所寄。这种希望中正包含着一如既往的以文学与国运相联系的思路。”这一时期诗、词、古文、骈文等古典文学各体的创作均极丰富，古典文学各体的研究同样堪称繁荣，所以刘纳将之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期。所谓“回光返照”确可用以指古典文学各种体裁的创作情形，而就古典文学的研究来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甚至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期间，古典文学以及整个国学研究都根本不曾中断。

王瑶先生早就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抨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所抨击的对象并不是历史上的桐城派或选学派，而是当时以摹仿古人为能事的旧式文人，所以才叫‘谬种’或‘妖孽’。”刘纳在上引书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见解，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时常提到“五四”新文学发难者对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激烈的否定态度。但重读《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这两篇发难檄文，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驱的批判矛头与其说是指向文学史上的古典作家，不如准确说是指向当日旧文学的作者们。

中国旧文化素来缺乏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因而以张扬二者为标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

律确实以反传统为开路先锋，并以此著称于后世。但唯其反对的是传统文化中民主和科学的匮乏，传统文化的具体成果并非为其一概拒斥，毋宁说相反，反传统最炽烈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未必不从中汲取养分，包括从中汲取反传统的养分。胡适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连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是从古典文学中得到启发，更不用说在新文学运动的过程中，本身还存在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文化思想。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这些后人所加的名称表示着命名者颇具倾向性的评判，是否准确这里不讨论。但当时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文化思想的存在确是不争的事实。是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文化思想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悦耳动听的大合奏，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和博大。而“在相当一个时期，一些人往往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只有‘激进主义’才对文化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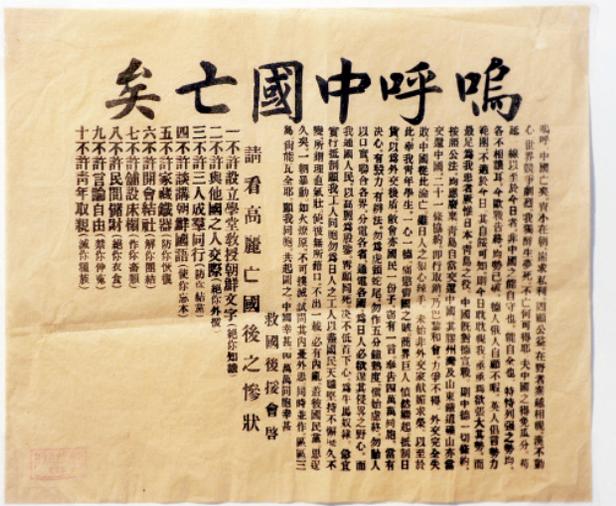


民主思想的先行者梁启超

‘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则是阻碍文化向前发展的力量。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或者说至少是值得重新讨论的。在文化转型时期，对文化问题总会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在20世纪这一文化转型时期，对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不同三派都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文化的大动荡这同一问题，而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正是这三种不同趋向的文化合力推动着文化的发展。”这其中，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开始的“整理国故”思潮特别值得重视。这不仅由于它是新文化运动中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潮，对于研究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国学研究史来说，更能从中捕捉到新时代学术研究思想、方法和精神的新变的种种信息，对于我们认识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转型颇有帮助。

“国粹”与“国渣”

在“五四”时期，“整理国故”作为一种文化主张最早并不是出现在新文化运动阵营，而是出现在1919年初刘师培和黄侃等支持成立的“国故社”中。该社同仁刊物《国故》1919年第1期明确提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口号。但几乎同时，新文化阵营中也出现了“整理国故”的声音。这年4月，傅斯年在自己和友人主编的《新潮》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学问不论哪一派，现在都不曾整理的状态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不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整理国故”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新时代的色彩。5月，毛子水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说研



存于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的展品

究国故“可以知道中国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不很发达的缘故，我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它”。11月，胡适提出“国粹国渣”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到了1923年1月，胡适又说，“‘国故’包括‘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余祥森也提出了类似的“两种国故”的概念。所谓“国故二字实含有善恶两种”，前者有“高深思想，完美格式，浅显文字”，有“独创”性和“永久的价值”，后者“只重字句不重思想，只重模仿不重创作，只拾前人的余唾去压服时人，不讲人生的真理，去感发人心”。对于前类应给与充分研究和大力弘扬，对于后类“正该取深恶痛绝的态度，岂可还去研究他”。这些均可视作新文化运动阵营整理国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与当时刘师培等守旧派因反对西学而倡言国粹实质不同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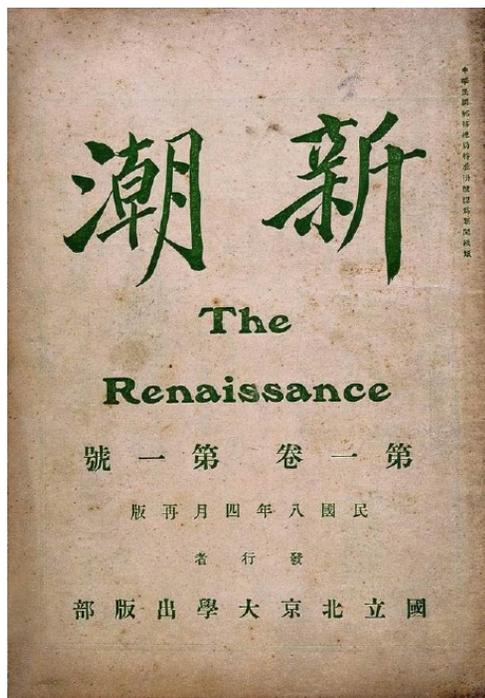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是中国人历史久远的文化情结，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作为道德和政治教化的工具，这是传统文化人心目中的理所当然。近代文学产生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东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救亡图存与开启民智是近代文人最大的道德与治化。他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既要输入“欧西文思”以启蒙，又要匡时济世以救亡。传统的文学教化观和社会功利观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和历史条件下被前所未有地扩大和提升了。

梁启超作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一段是最为典型的表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其后数年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也说：“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这些言论虽就小说而发，也代表着对一切文学创作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紧接近代文学之后，反帝反封建和思想启蒙仍然是继续面临的任务。因此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评判作品的标准，研究国学的尺度，都不可能不仍然是以有益社会的功利目的为最高准则。20年代新文化阵营的“整理国故”，如果问它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可以用当时一个响亮的口号来回答，就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开宗明义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毛子水在上引文中说：“倘若要研究国故，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可以这么说，“科学精神”的含义首先就是指学术应有利于时代与社会，研究过去的国故是为建设将来的文化的研究原则和治学理念。这一整理国故的精神和理念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显示的是新的时代气息。从中已经不难看出后来对于国故“精华糟粕”的二分模式和“古为今用”的基本思维的雏形。这种学术研究的原则和理念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当然会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它们在后来者的继承中是否有趋于僵化和庸俗的现象，更不是它所应承担的责任。可以肯定的是，它对整个20世纪学术研究的影响是至为重大的。

归纳、历史与进化

在“五四”前后，被当作学术研究思想和原则的，还有胡适总结的“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和“归纳的理论”：“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所在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这并非胡适一人的主见，而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归纳”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是从个别前提推出一一般性的结论，是对经验事实的概括。作为人类认识和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归纳的理论”本为中外古今共同具有。胡适就说清代乾嘉学术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相互为用的，所以“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暗合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暗合是“不自觉”（同前）的。对于“五四”时期提倡“整理国故”的新文化运动者来说，他们所接受的思想资源似乎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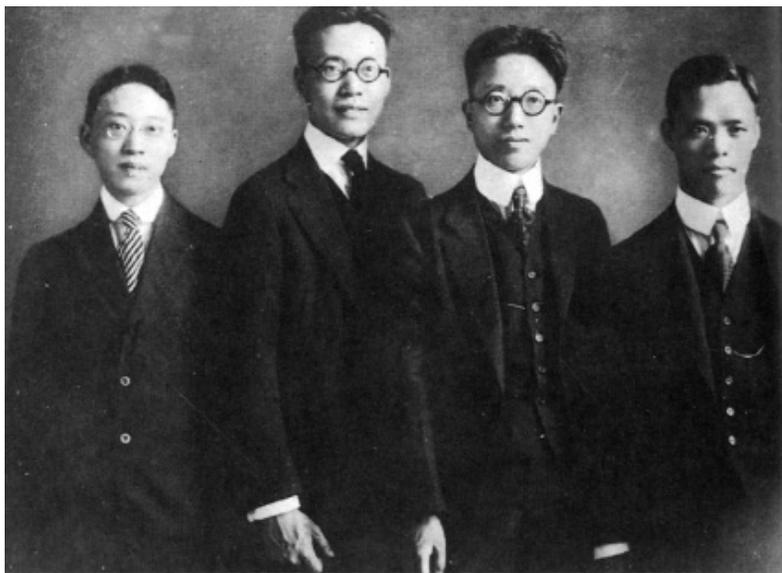
民国八年的《新潮》杂志

多地来自西方的影响和启发。郑振铎便说：“归纳的考察，倡始于培根。有了这个观念，于是近代思想乃能大为发展，近代科学乃能立定了它们的基础。”“自归纳的考察方法创立后，‘无征不信’便成了诸种学者的一个信条。”

“进化”

作为一种有系统

的科学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达尔文是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进化论后来又引进社会和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严复是较早介绍、宣传进化论的人物，戊戌维新派多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思想为武器，以激发国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信心。流风所及，“五四”以来更成为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化思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宗经崇圣观在这种进化论面前再难立足，土崩瓦解成为其必然的命运。在文学理论界，这种进化的观念也深入人心，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表明“五四”之前已经成为学者用以指导研究的一种学术思想，“五四”前后更成为反拨积重难返的崇古和复古之风，进行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胡适一再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郑振铎也说：“文学是时时在前进，在变异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既然如此，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的研究也应该时时前进。这自然要求对过去的一切遗产加以重估。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便引用尼采的话明确表示出这一点：“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郑振铎也要求“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



1917年至1920年，胡适（右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与金岳霖（左二）、张奚若（右一）等的合影

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文学，都应另打基础”。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包括鲁迅在内都是进化论的推崇者。进化论不仅很快被运用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中，也体现在文学史的撰构中。罗根泽在30年代评价当时的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流变史》时就说：“‘五四’以前泰半是用观念论

的退化史观与载道的文学观来从事著述，例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和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五四’以后则泰半是用观念论的进化观与缘情的文学观来从事著述，例如陆侃如和冯沅君合编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本书。”

胡适所谓“历史的眼光”，内含颇为丰富。首先是融入了上文所述“进化”这粒“神丹”，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就明确批评“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所以实是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除了“历史进化观”这层重要的含义外，还指“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一切狭隘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同时还指将作品置回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结合它们的时代来加以研究。“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用顾颉刚的话说，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

这三种观念是否一定起到“起死回生之神丹”的作用姑且不论，它们，尤其是后二种对本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影响确是不可低估的。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传统文化的全面重估，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视角的不断变化，研究方法和批评模式的不断更新，从根本来说固然取决于每个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却也无不与“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的影响息息相关。